

试论马丁·路德在新教会建设中的活动

张娟

(常州工学院 教育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22)

摘要 路德积极参加新教会组织、经典、教义和礼仪方面的建设,为新教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路德宗教会成为了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天主教会的一家崭新的教会。路德宗国教化主要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是由路德造成的。对路德在新教会建设中的活动应予以充分肯定。

关键词 路德宗教会 路德 国教化

中图分类号 :B9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5)03-0042-04

16世纪发轫于德意志,波及全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思想革命运动。积极参加路德宗教会的各项建设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和杰出领袖马丁·路德中期(1521年沃姆斯会议后~1525年)和晚期(1525年农民战争后~1546年)所从事的最主要的宗教改革活动。国内史学界对路德在路德宗教会建设中的活动尚未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对“路德与路德宗国教化之关系”这一相关重大问题却颇有争议。国内外均有史学家认为路德应对路德宗国教化负主要的责任。也有西方学者指出路德宗国教化从来就不是路德的意图。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路德与路德宗国教化之关系?本文将对上述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路德在新教会建设中的活动及其作用

1. 倡议并参与巡察活动,使新教会克服了混乱软弱状况

1521年底,德意志一些教会开始实施路德的某些宗教改革主张,这意味着路德宗教会产生了。然而,由于新教会此时尚未有统一的章程和教义,社会下层激进改革派用激烈的方式改革教会,这使新教会在组织活动时呈现出混乱状况。农民战争后,新教会的人事问题十分严重。神职人员队伍软弱,且出现越轨行为。他们有的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有的年老力衰以致无法胜任其工作;有的甚至在公共场合醉酒。此时的新教会既混乱又软弱,还随时面临来自皇帝和天主教诸侯的攻击和镇压。显然,这样的新教会只有在强有力的新教诸侯的支持下,才能

与天主教势力相抗衡,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最终确保宗教改革事业走向胜利。于是,路德等新教神学家向新教诸侯发出了呼吁,1525年10月,路德上书萨克森选侯,建议把萨克森选侯国分成4~5个区,由选侯到各区巡视教会信仰、礼仪、人事和财政等情况,撤换不可靠、不称职的神职人员。这就是路德所主张的巡察活动。根据路德和其他新教神学家的建议,选侯于1528年正式组织巡察活动。路德随同选侯参加了最初的几次巡察。巡察员们在两个月内视察了38个教区,他们考查了牧师对教义的理解,并调查了他们的行为表现,免除了不称职的神职人员的职务,撤换了原有的主教辖区,而将萨克森全境分成若干教区,每教区设有“监督”一人,监督不得干预教区行政事务,直接对选侯负责;统一崇拜仪式,没收修道院的产业、圣坛基金等。巡察活动使萨克森境内新教会基本上克服了组织上的混乱软弱状况。随后,北德意志大部分新教诸侯也仿效推行了类似的巡察活动。

2. 翻译《圣经》,使新教会拥有自己的宗教经典

路德的《圣经》翻译工作早在他1521年隐居瓦特堡期间就开始了,他用3个月的时间将希腊文《新约圣经》译成了德文后,立即投入了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路德晚期虽然疾病缠身,但他仍然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从事《圣经》翻译工作。1534年,路德的德文《圣经》出版了。后来他又不断地对其译本进行修订,最后这个译本成了德文《圣经》的权威性版本,所用文字简洁优美,语言生动准确,且十分本色化、民族化。

对于任何宗教的信仰者来说,拥有其宗教经典是最为重要的。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早期路德宗信徒来说,如果没有路德的德文《圣经》,他们的经典便是普通人无法读懂的拉丁文《圣经》或晦涩难懂,错误百出的非标准德文《圣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路德的通俗易懂的德文《圣经》的问世,才使路德宗信徒从此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宗教经典,标志着路德宗教会真正建立起来了并使宗教改革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路德的德文《圣经》既是路德宗教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起到了统一德语的作用,并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是路德对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一项巨大贡献。

3. 编定教义、礼仪,促成教会生活的民族化、平等化、节俭化

路德一贯主张“众信徒皆祭司”,信仰上人人平等。他重视广大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便于普通人参与,他主张在教会活动中尽量使用本民族的通俗语言,1526年,路德为新教会编订了德文弥撒仪式。1529年,他用德文写了大、小《教义手册》,据估计《教义手册》在其出版后的头30年内就售出10万份。尤其是他的小《教义手册》,语言生动易懂,并配以木刻画,十分适合儿童记忆和对普通民众进行宗教信仰教育。路德告诫牧师们要把普遍信徒作为布道的主要对象,应当“避免宫廷词汇,使普通群众明白这些话语。”^[1]他还说:“一个敬畏上帝、正直的讲道人应当在讲道时特别注意到贫穷质朴的人,他们所讲的应当清楚明白,好使那些简单未受教育的人可以了解、牢记在心。”当我讲道时,我所注重的,就是许多青年人、儿童、仆役。^[2]路德晚年不顾体弱多病,经常深入乡村讲道,探望穷人。路德是最早创立“众赞歌”这一教会音乐形式的人,这一形式使参加礼拜的全体信徒都加入到颂唱中来了,改变了以前只有圣诗班和主持礼拜的神职人员才可以颂唱的做法。路德还在教会实行所有信徒一同领饼酒的圣餐礼。

路德也尽量使教会礼仪节俭化。一般来说,他中晚期只坚持圣餐和圣洗为正式圣礼。1523年,他编订了圣餐和圣洗礼仪。3年后,他虽然恢复了弥撒,但清除或削减了天主教豪华的崇拜仪式场面,并且他没有将弥撒定为正式的礼仪。他反对呼求圣徒、修道誓愿、和朝圣等陋习,从而使新教会向节俭化迈出了一大步。

4. 在教会建设中坚持“因信称义”的原则

路德早期提出了“因信称义”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为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统治的锐利的思想武器。^[3]因信

称义”说是路德全部宗教改革理论的基础,也是其宗教改革活动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在路德宗教会建设中,他亦坚持强调这一原则。路德在路德宗教会的威望很高,但他不仅没有在教会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且反对人们树立他的权威,他甚至反对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新教会,他说:“我首先恳求人们不要以我的名字来命名,不要自称路德信徒,还是称作基督徒好。路德算什么?教义又不是我创立的。我也没有为谁上过十字架。”^[4]路德坚决反对树立任何人和思想的权威的目的在于维护“因信称义”的权威。

如果说路德早期的著作为路德宗教会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话,他中晚期的活动则主要是将其理论付诸于新教会建设的实践当中。路德积极参加新教会的组织、经典、教义和礼仪方面的建设,为路德宗教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路德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路德宗教会成为了欧洲历史上的一家崭新教会,它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天主教。它坚持“因信称义”的原则,主张教会民族化、平等化、节俭化,这一切都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因此,路德宗教会的建立实质是资产阶级反对天主教封建统治斗争的伟大胜利。

二、路德与路德宗国教化之关系

路德宗国教化是指诸侯成了教会的实际首领,他们控制了路德宗教会,并利用它来为其统治服务。路德宗国教化使诸侯实力进一步加强,从而加剧了德意志分裂割据的局面,这与西欧历史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不利于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路德宗国教化是德国意志的历史悲剧。

1. 并不是路德教会观的变化导致了路德宗国教化

某些西方学者认为路德晚期的教会观有了本质的变化,导致了路德宗国教化;“农民战争使路德对‘普遍人’产生了一种永远不能磨灭的怀疑……因此他不会去做任何有助于新教会成为民主教会组织的事情,并促使他把他的宗教改革运动交给俗界控制,以致将世俗政权看成也有宗教职能。”^[5]

在上文所提到的巡察活动中,路德承认诸侯对新教会具有监督权。即诸侯应当禁止违背路德宗的异端邪说的传播和错误礼仪的使用,而且有权罢免不称职的神职人员并任命新人来代替。在路德看来,诸侯行使禁止权、罢免权和任命权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是为了纠正错误和不合理的情形,否则,诸侯不应使用这些权利。路德主张诸侯有权没收修道院产业、圣坛基金和什一税等,但认为其中一部分应用于教区教堂和教区学校的开支。路德认为诸侯有责任保证地方教会所必需的财力。总之,在路德

的设想中,诸侯在新教会中主要发挥一种监督、协助的作用,而不是指挥、操纵教会的专制作用。^[6]

路德虽然不想使新教会被诸侯所控制,但他承认诸侯在巡察活动中对新教会具有监督权,这显然不符合他早期所向往的具有纯正信仰的信徒们自愿结合、自行决定仪式和推选神职人员的“自治自理”的理想教会模式,路德本人也承认这一点。^[7]他之所以承认诸侯对新教会的监督,是因为当时新教会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因此急需得到新教诸侯的支持,对于路德来说,把新教会置于诸侯监督之下,主要是鉴于当时形势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性的措施。巡察活动开始时,路德就强调这一活动的临时性质。^[8]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路德承认诸侯对教会的暂时监督权的做法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早期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中已公开提出:如果教会不能履行其职,国家在紧急情况下有权干预教会事务。路德晚期在路德宗建设中借助于诸侯的力量来扶助软弱的新教会的做法是上述他早期的主张在新形势下的必然发展。

在思想上,路德始终未放弃其“自治自理”的教会观和“政教分离”的原则。1528年,他在布道中重申“我们一定不要忽视民政管理与灵魂管理的区别,因为诸侯不能也不应该宽恕他人,他的管辖不同于基督的管辖,那就是为什么皇帝要举着剑而基督的国是为被搅乱的良知而设。”^[8]16世纪30年代初,路德提出不应该服从包括皇帝在内的世俗权威对灵魂领域事务的强制。1545年,他又阐述了世俗政权无权干涉上帝领域的原则。^[9]

教会“自治自理”、“政教分离”是近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理念,也是路德毕生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路德承认诸侯对新教会的暂时监督权并不违背其早期的主张。终其一生,他的教会观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不能说“路德教会观的变化导致了路德宗国教化”。

2. 也不能认为路德宗教改革立场的“蜕化”导致了路德宗国教化

我国一些研究者认为:路德晚期宗教改革立场的“蜕化”是路德宗国教化的根本原因;路德教派因路德倒向诸侯怀抱而蜕变为诸侯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10]

路德在其早期的纲领性著作《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中已清楚地表达了依赖世俗权力进行宗教改革的立场。在此书中,他对皇帝和诸侯寄予厚望,极力呼吁他们惩治神职人员的邪恶,铲除天主教的种种弊端,扼制罗马教廷对德意志的经济掠夺。在此要指出的是,路德早期从未主张依靠人民和人

民革命进行宗教改革运动。人们常引用下面一段路德的话来证实他早期支持暴力斗争:“如果他们(指罗马僧侣——恩格斯注)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对付他们了。”^[11]其实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路德认为暴力对付天主教的特权只属于世俗权力,这也是路德早期依赖世俗权力进行宗教改革的又一体现。由于德意志皇帝不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新教诸侯便成了他依赖的对象。

1521年沃姆斯会议后,社会下层用激进方式改革教会,引起骚乱。在新形势下,路德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的主张与人民群众激进改革教会的要求之间潜在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了。1522年6月,路德在维滕贝格讲道8天,极力呼吁群众不要用暴力方式推进改革。农民战争前后,路德撰文极力攻击激进改革派和群众的暴力行为,这说明,路德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的主张与人民群众激进改革教会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激化了。矛盾激化的原因在于人民革命给路德宗教改革所依赖的力量即诸侯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农民战争后,路德在新教会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诸侯的依赖。此时新生的路德宗教会内外交困,岌岌可危。为了确保宗教改革事业的胜利,路德和其他新教神学家把新教会的监督权暂时交给了新教诸侯。路德承认诸侯对教会的暂时监督权的做法与他一贯的宗教改革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纵观路德一生的宗教改革活动,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是他一贯的立场。诚如国内有学者所言:“路德把诸侯作为依靠力量,这是他始终如一的主张。在农民战争前后,在依靠诸侯这一点上他仅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区别。”^[12]既然路德一开始并未主张依赖人民革命而是主张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那么他中晚期一度激烈反对农民革命,更加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只是他的一贯立场在新形势下的必然发展,而不是什么“蜕化”。因此,认为“路德宗教改革立场的‘蜕化’导致了路德宗国教化”的说法亦是欠妥的。

3. 路德宗国教化主要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罗马天主教会仍然是控制西欧各国的“超国家”组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自罗马天主教会的封建束缚和经济掠夺令德意志人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民族矛盾已成为德意志社会的主要矛盾。德意志迫切需要展开一场针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封建斗争。这场斗争的领导权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市民阶级正在形成中

的资产阶级)身上。路德一开始就针对时代的要求,提出了改革宗教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宗教改革的中心目标。然而,自9世纪查理帝国分裂后,德意志一直处于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这一局面严重地阻碍了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致到宗教改革时代的德意志,仍然是诸侯各霸一方,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资产阶级尚未形成的局面。路德想要反对势力强大的天主教会,完成时代赋予市民阶级的历史使命,必须采取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的立场。历史证明,正是依靠新教诸侯的支持和帮助,以路德为首的市民阶级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才实现了路德最初提出的宗教改革的中心目标。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路德所采取的宗教改革立场是正确的。

然而,路德对诸侯的依赖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主要是为路德宗国教化提供了方便之门。在巡察活动中,路德把新教会的监督权暂时交给了新教诸侯,他们借机逐步控制了新教会的人事和财政大权,使路德宗走上了国教化的道路。贪婪的本性使诸侯日益加紧了对新教会进行财产侵吞和人事控制。16世纪40年代,萨克森选侯国路德宗教会建立了宗教法庭,选侯把它作为控制新教会的重要工具,路德宗教会就这样沿着国教化道路越滑越远。

面对诸侯利用其监督权,对新教会进行财产掠夺和人事干涉的行径,路德十分震惊,他批评萨克森选侯:“竟不顾我们灵魂的拯救,借助我们的努力,使多少本该用之于教会的钱财流入,并将更多地流入他无底的钱袋。”^[13]1541~1542年,当萨克森选侯准备强行任命新教神学家阿姆斯特道夫(Nicholas Von Amsdorf 1483~1565年)为纽伦堡城主教以代替该城牧师会推举的人选时,路德力图说服他放弃此举,要求他不要超越监督人的权限,应当尊重当地教会的人事决定权,并一再对教会的财产严重世俗化表示关注。

表面上看,似乎是路德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的立场直接导致了路德宗国教化,其实不然,路德宗国教化的真正原因在于,宗教改革时代的德意志,诸侯力量十分强大,资产阶级力量却非常软弱,二者力量相差极其悬殊。路德当时正确的宗教改革立场事实上却产生了某些消极的作用,这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造成的。路德宗国教化并不是路德的所作所为,也不符合他的本意。诚如某些西方学者指出的:“路德决不想要把教会屈服于国家之下,这是他一生持守至死不变的原则。”^[14]路德教的结局与路德本

来的意图大相径庭。^[15]

史学界正确地指出了路德宗国教化的反动性,但有些学者认定路德是路德宗国教化的罪魁祸首,这是有失公允的。在上文中,我们已初步论证了路德宗国教化的主要原因不在路德,同时还应看到,路德宗国教化虽然是宗教改革事业中的败笔,但路德宗教会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又是宗教改革事业的胜利。路德宗教会尽管有不足和污迹,但与天主教会相比,却是崭新的一家。它所坚持的“因信称义”、“众信徒皆祭司”等主张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天主教的封建等级统治,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教会礼仪廉俭化”的主张则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对逐渐国教化的路德宗教会,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路德在路德宗教会建设中的活动应予以充分肯定。

参考文献:

- [1] Currie M A. The Letters of Martin Luther[M]. London: Macmillan, 1908. 131.
- [2] 马丁·路德. 桌上谈路德选集(下)[C]. 香港: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68. 291—331.
- [3] 李平晔. 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J]. 世界宗教研究, 1983(1): 123—131.
- [4] 汉斯·李叶. 路德传[M]. 华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5.
- [5] 托马斯·马丁·林赛. 宗教改革史(上)[M]. 孔祥民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292.
- [6] Nuelsen J L. Luther: The Leader[M]. New York, 1906. 179.
- [7] Kostlin J. Life of Luther[M]. New York, 1883. 349.
- [8] Bainton R H. Here I Stand[M].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50. 244, 274—275.
- [9] Edwards M Jr. Luther's Last Battl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3. 186.
- [10] 郑如霖. 略论马丁·路德[J]. 华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2(3): 98—107.
- [11] 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383—483.
- [12] 于可. 关于马丁·路德评价的几个问题[J]. 世界历史, 1983(6): 24—33.
- [13] Febver L. Martin Luther: A Destiny[M]. New York, 1929. 267, 172—182.
- [14] 罗伦培登. 这是我的立场[M]. 陆中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3. 291.
- [15] 乔治·H·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下)[M]. 刘山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417.